

高层动态

◆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3月28日至29日在河北省正定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批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月29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会议并讲话。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主席会议3月2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并讲话。
均据新华社

综合

“战神”展翅



中国空军轰-6K战机组海上飞行训练(资料照片)。

3月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在空军“神威大队”展开，大队飞行员看到一条“战神新闻”倍感振奋：空军3月下旬出动轰-6K、苏-30等多型战机，编队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成体系前出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训练，提升远洋机动能力，检验远洋实战能力。 新华社发

河南全面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据新华社郑州3月29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4月10日起，河南省所有地市将全面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警方提醒消费者，一定购置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汽车。

据了解，2017年11月以来，河南省郑州、安阳等5市分两批次先后启用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效果良好。按照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4月10日起，开封、洛阳、平顶山等13个市也将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届时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覆盖河南全省。

韩朝决定4月27日举行首脑会晤

据新华社首尔3月29日电 韩国和朝鲜代表29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双方商定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首脑会晤。

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的消息，韩朝双方还决定于4月4日在板门店就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问题进行实务会谈。双方还将对其他具体问题通过文件互换形式继续协商。

画里有话



“窃密”

据央视报道，号称全球用户总量突破9亿的手机软件WiFi万能钥匙、WiFi钥匙，不仅能随意窃取个人的WiFi密码，也能轻松窃取商业机构、政府部门的WiFi密码。除了蹭流量，一些黑客还可以对银行卡密码等信息进行窃取。

大家要有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千万别去贪小便宜，自己的WiFi一旦被分享出去后，将会有诸多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每日电讯

为何学校越来越松，家长却越来越“疯”？

最近，各地教育部门减负新视频频出台：江苏省发布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

浙江省“减负令”除延迟到校时间外，部分地区还试行“中学生做功课至晚上10点可以选择不做”“小学生晚上9点可以不做”。

然而这些新政并没有得到一片叫好声，除了质疑治标不治本的痼疾外，人们还开始反思减负本身的合理性。

如今，越来越快乐的学校教育，却似乎让家长越来越“疯癫”了：陪写作业鸡飞狗跳，孩子要做好自我防护；月薪3万撑不过一个暑假，家庭收入一半用来报培训班……人人盼减负，人人又怕减负。

疯癫般的家长，慈母般的老师

开学第一天，南京市公务员黄颖发了一条朋友圈：“又开学了，但愿母亲慈孝的模式一直在线。

令她“心寒”的是，评论里一片“不可能”“不可能+1”“+10086”，队形整齐。

愈演愈烈的“报班热”，越来越长的补课账单，让置身事外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

四五年前，湖北武汉的徐女士因为给5岁半的儿子报了17个辅导班，花费12万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着急妈妈”。

时至今日，“一周八九节辅导课，每周休息半天”“家庭一半收入给孩子补课”等情况早已席卷全国。

“家长有种病，自己觉得是奋斗，别人觉得是中邪。”

南京一位家长感慨，生孩子前看见这种新闻都觉得“这是疯了吧，等我生了娃云云”，等到置身其中，才发现迟早都会混然众人。

“大老爷们”上班时讨论小学孩子的奥数题，另外“半边天”呼朋唤友在微信群里秒杀“原版教材”和性价比最高的打印机，放学后一群爷爷奶奶负责去课外班占座，另一群爸爸妈妈不停带着娃和外卖奔向教室……

凡此种种已成为目前众多有娃一族十分标准而又波澜不惊的生活常态。

与此同时，“现在的老师太好当了”“现在的学校太会用锅了”则成为家长们的吐槽金句。

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陪伴孩子学习……有位家长告诉半月谈记者：三年级时，孩子一学期才用了不到两个生字本。孩子的拼音、书写掌握得远不如自己当年，期末还得自己打印资料复习。

教育专家认为，细究这样的“金句”，还是要搞明白家长究竟在抱怨什么？

不是对老师有意见，而是对家庭教育与校内教育的“错位”有意见，对教师的专业教育活动向家长转移，对家庭教育职责的无限放大意见。

减负令严格地限制了学校老师的能动性。一、二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不能排名，否则将可能被家长投诉。

北京海淀区某小学四年级的某班，就因一名老教师让孩子写作业被家长告到教委，事后即便全班其他所有家长挽留，该名“负责任”的老教师仍被迫离开原有的教育岗位……

公立低保化，农村边缘化，教育资本化

在减负的大背景之下，校内不留作业，校外补；校内不分班，校外分；校内不考，校外考；校内不竞赛，校外大比拼……

所有校内因减负放弃的“阵地”与“跑道”，现在已由校外全面接管，导致辅导教学“喧宾夺主”现象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出台花样繁多的减负政策，换来的却是家长越来越冷漠的反应，甚至是“请不要再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控诉，以及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马太效应。

一是公立低保化。“要择校，到民校”“初中不进民办，大学就进民办”，公办教育在某些教育市场比较成熟乃至过热的地区，正在呈现出一种“低保化”的趋势。

曾担任校长与教育局局长多年的吴晓茅说：公办学校越是对减负政策执行到位，其结果越是令人尴尬。

根据2017年江苏省南京初中名校中考均分排名，排行榜前9名中7家是民办；两家公办学校中，南外是唯一一个可以跨区域掐尖招生的特殊公办，树人则刚刚由民办转为公办。

“很多薄弱的公办初中连中考全市平均分都达不到，办学质量不高，导致学校对家长和学生更没有吸引力，生源困难，形成恶性循环。”吴晓茅说。

“公办省钱，民办省心”也逐步化为泡影，补课正在成为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家长需求时候的刚需。

南京的家长陈先生买了学区房把孩子送进了公办小学，上到二年级就后悔了：“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放学，作业很少，不能排名，学校因为强调素质教育而限制的东西，家长都得通过校外烧钱弥补回来。”

二是农村边缘化。当城市家庭为了下一代的未来不断用“烧钱”的方式“增负”时，乡村教育正在放任自流。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公务员韩飞在回老家山东枣庄时写的一篇《乡村青少年的未来被“吃鸡农药”重重围困》在网络引发热议。

该文说，“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聊起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谈起别的，则‘兴趣缺缺’，甚至压根就不答话。”

韩飞与这些孩子的家长交谈，“当我谈起未来两个字，他们往往自嘲且讽刺地一笑：‘农村人谈什么未来，中学毕业出去打工就是了’。”

三是教育资本化。不少家长坦言，小升初不考试，但优质初中却是稀缺资源，当“竞争跑道”不再清晰，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方法上也从“短跑”“竞速”升级到“花样赛”“障碍赛”“马拉松”，家长在课外辅导班花费不菲、学生疲于奔命的状况只能更胜从前。

正是由于公办教育不断减、不断退，唯恐孩子掉队的家长们才会陷入军备竞赛，资本成为教育的主宰。

减负不能减责任、减质量、减求知欲

为什么人们一边盼着减负，一边又害怕减负？仔细分析，当你害怕减负时你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校



内减负，校外增负；怕的是我减了，别人不减；怕的是减负减负，减负变成减责，衍生出更多“潜规则”。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全国两会期间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减负”概念：什么叫负担？

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在这个以内的，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教育专家认为，尽管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呼声，但本质上，减负的方向是正确的，回归教育本质的战略是正确的。

关键在于，人们呼唤的是真正的减负，不能减责、不能减质，更不能打着减负的旗号夹带私货，同时还要尽快提质、均衡，才有可能让学生在应付考试之余有更多时间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

减负不能偷换概念，求知欲不是负担，正常的竞争不是负担，老师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不是负担。

《拼娃：学霸世家谈教育》一书的作者张捷认为，资源稀缺必然需要竞争，而减负是减不掉这个竞争的。没有了公开的公平的竞争，潜规则就会横行。

吴晓茅认为，我们制定的很多政策过于理想化，与现实脱节，才会招致抨击。

“优质均衡的基础未能达成前，广泛被群众认可的公平即统一考试如果被剥夺了，那权、钱的寻租空间就必然出现，草根阶层的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就会产生。”

回顾初心，减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削弱教育，而恰恰是为了给予家庭更多的个性选择空间，去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创新能力，解决高分低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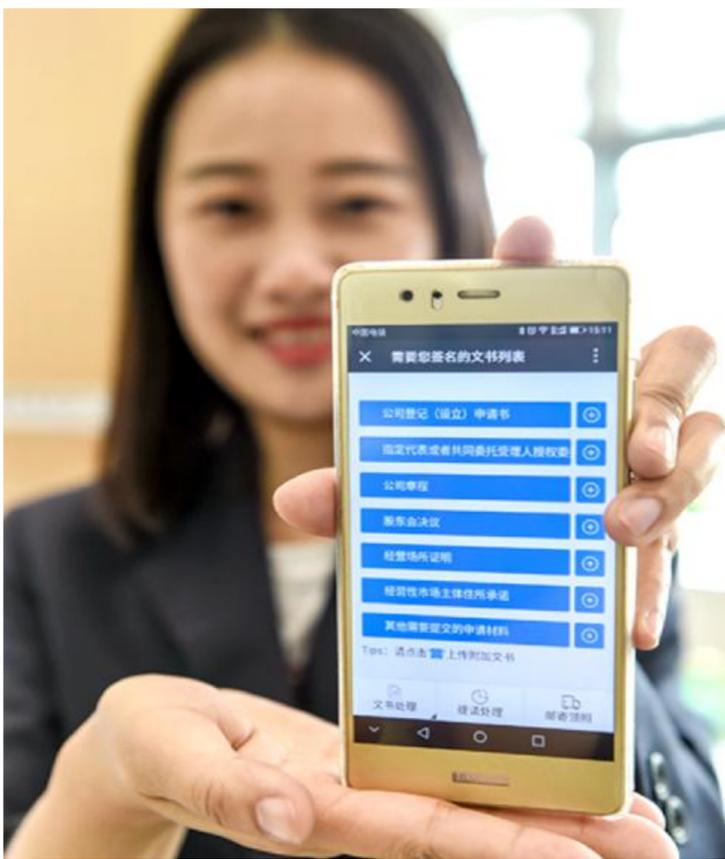
然而，对很多家长而言，素质教育就是让孩子多学几项技能。

应试教育的现实与家长主动增负，说浅了是种“剧场效应”，是三人成虎的焦虑感；更深层看，是民众对更好教育服务的追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长期不平衡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补课乱象、学生负担重等都是表象。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今年两会期间引用古诗，用“一山放过一山拦”形容几十年减减负，负担却越来越重的“死结”。

现实中，教育系统关乎基本民生，情况又错综复杂，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学生、家长、社会等真的减了负担，老师、学校、教育官员就势必增加了义务与责任。 转自《半月谈》

“不见面审批”



3月29日，在南京市栖霞区商事登记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展示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的“不见面审批”系统。

近年来，南京市栖霞区不断创新、升级商事登记“不见面审批”系统，形成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新模式，由“群众跑”变为“数据跑”。

目前，“不见面审批”系统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后台数据系统实现和市工商局以及多个

部门的兼容共享，系统平台还同步对接10个街区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联政办窗口。无论是手机上、登记柜台前、自助终端上，只要“刷脸”成功、人证一致，后台审批人员即可实时审批、当场发放(免费邮寄)执照，连签名和盖章都可以在线完成，实现群众办事事项“不用跑、不见面、能监督”。

新华社发

评论

转自光明网

上当受骗，这不是有没有知识的问题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九旬退休高工两年内被“易宝林养生馆”骗光全部积蓄，数额高达300多万。事件缘起于一次免费的足疗，之后在诱导下一步步消费，甚至连收据都被骗走。在新闻中，老人的“国家某研究院的退休高工”身份被拎出，在新闻评论中，也不乏对这一身份的揶揄。这似乎是一种大众认知：上当受骗，是由于知识不足，只要具备足够的知识，行走江湖便无所畏惧，足以免于被骗。而当“高工”被骗，反倒是引发揶揄一片的笑谈了。

事实是如此么？检索新闻可以发现，近年来被骗的案列，高学历不在少数，“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一女博士被诈骗85万”“大学生被骗15万负债累累”，照例并不缺乏社会阅历的影视演员都会被骗——“汤唯在上海工作期间，遭遇电话诈骗被骗21万”。这还是具有眼球效应的新闻，结合生活中的案例不难发现，学历、职业、年龄、性别、阅历，究竟哪一个可以真正让人免于被骗的风险？揶揄高工被骗的网民，会不会是把自己看得太精明、把高工看得太单纯、把骗子看得太低能？

从新闻中可以看到，这家“易宝林养生馆”，可以说早已疑点重重：店内无执照、无公开电话、无价目表的“三无”养生馆，号称自己是在全国开了100多家连锁的品牌店，堂而皇之的存在多年；2015年7月14日，因擅自变更登记事项，被北京工商朝阳分局记录在案；2016年9月12日，因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北京工商西城分局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5月重新取得联系后被撤销；2015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事涉“易宝林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因诱导消费而起的民事诉讼案，最终，法院判决因证据不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这些，都没有阻止有人前仆后继地上当受骗。在构建了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现代社会，真正能防骗的，不是个体的知识、防骗的窍门、以人性恶为心里预设而形成的行为模式，而只能是制度。在现代社会，有效率的治理模式应当能将个体的私生活与公共社会作责任区隔，它应当能让个体以“单纯”的方式、甚至是像个“傻子”一般生活，对人报以信赖，不至于凡事本能地质疑基础的商业伦理、法律底线。个体应当被推到与骗子斗智斗勇的一线，承担起一系列诸如看执照、查资料、判断药品是否合规等等一系列将个体能力逼至极限的行为，而是应当将诸如资质认定、合法性判断等交由有关部门，让这种底线合规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毋庸置疑的前提预设。

这也是为什么有知识的人未必能免于防骗，任何人的知识都有盲点。再或者说，仰观天象、俯察万物的知识，为什么需要降格乃至庸俗化对他人处处设防的生存智慧、练达潜规则的市侩哲学？需知，“高工”“教授”“博士”都掌握不了的“知识”，不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要求。当社会上的个体越来越精明，越来越“主动”地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去填补公共治理，这种个体对机制的责任倒灌，未必是令人乐观的现象。

美国有一个传奇性的巨骗弗兰克·阿巴内尔，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冒充过飞机驾驶员、儿科医生等，用各种手段骗取几百万美金，二十一岁前便成为许多国家通缉的要犯。自1974年出狱以后，他协助FBI抓获了一大批金融骗术高手，并为银行等设计防伪支票，他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和外办办事处的顾问与讲师。这不妨视作一种启发，当一起诈骗案发生，不是围绕当事人学历的揶揄，再加几条小提示、小窍门；而是机制要围绕案例、诈骗者，再填补一个可能存在的漏洞。